



中国古代“名”的 政治思想研究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ing in Ancient China

曹 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的 政治思想研究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ing in Ancient China

曹 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 / 曹峰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325-8484-0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逻辑史—中国—先秦时
代—文集 IV. ①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9834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

曹 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06,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84-0

B·1013 定价: 7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0FZX01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池田知久序

值此曹峰教授新书出版之际,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的新书《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是一部大作,并不夸张。可以说,这是一部现代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的著作,并且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本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专著所具有的长处,我在此就不作具体、详细的介绍了,可以请读者通过实际阅读加以体认。下面,就本书在结构上具有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论上的意义,谈几点本人感受到的优点。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国以落后者的身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对于历史上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最初仅仅理解为是军事、政治领域等外部方面的原因,之后逐渐向内部深入,在以思想、哲学、学术为中心的文化领域,也开始回首传统的中国文化,做出反省式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全盘推出,绝非中国劣等论基础上东西文化优劣论、全盘西化论、东西文化比较论那么简单。

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具近代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这些研究有这样两方面的特征:其一,认为军事、政治、国家、社会等存在的背后,是思想、哲学、学术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哲学、学术等作历史的追踪。其目的在于,克服传统文化史上消极的一面,张扬积极的一面,为将来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从事国家、社会建设方面基础性的工作。其二,对西方的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等文化史观念有着不断的、强烈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展开中西之间的比较、对照,同时指出,与西方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文化在中国也存在,甚至不少人主张中国有着超越西方之上的文化。其目的在于证明,上述的国家、社会建设方面基础性工作,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而言,有着充分的实现可能。其实,上述两个特征,就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明治日本(假如把“中国”置换成“日本”)的状况而言,也大体相当。而且,可以说对当时亚洲所有的后进国(发展中国)而言也都是大体相同的。

这样一来,近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研究中,西方古代以来的学术用语、研究方法、理论体系,被大量地有时甚至过度地加以采用。其结果是中国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直至今天为止,使用来自西方的框架成为极其一般的普遍的现象,导致目前的中国思想史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过度的西方化现象。站在今天的立场,很容易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根据产生于现实社会的中国思想史的实际状况,把中国思想史朝西方文化方向做了不恰当的歪曲,从而导致误解,存在缺陷。然而,就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今天对其一味加以指责也是不合适的吧。

中国思想史领域中,有不少门类都产生过这类大量的过度的西方化现象,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名”的思想史。这一领域西方化的实际状况,因为本书序言《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思路》已经有多重的、详尽的说明,这里就省略了。随着这种西方化的进展,人们在从事中国思想史上极有特征的与“名”相关各种思想的研究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到,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容易置于基础地位的、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及知识论(认识论)意义上的“名”,而本来具有相同地位甚至具有更重要地位的、伦理思想意义上的“名”及政治思想意义上的“名”却被轻视甚至无视了。

为了复原中国思想史鲜活的原貌,从根本上修正那些歪曲和误解,曹峰教授在本书中首先从“名”的政治思想史入手展开了研究。虽然这看上去是当然之事,但这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纪曹峰教授这里才变得可能。

第一,现代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为止,文化及历史的普遍主义都是极为正常的一般的观念。——即西方的文化与历史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即便在中国,西方的标准也无疑是合适的,因此,中国人也坚信必须依据西方的观念来研究自身的文化与历史。以历史观为例,“古代以前的亚细亚社会结构→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中古的农奴制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图式,作为世界史普遍的发展原则曾被广泛讨论,我们都记忆犹新。这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而已,在文化与历史的许多领域,这种普遍主义都根深蒂固。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文化与历史上的价值多元主义、地区个别主义开始正式登场,前面提及的普遍主义势力渐渐消退。如果进而补充上述的历史观,那么可以说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事实上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前述世界史发展普遍法则正确性的认识。这也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而已。然后,到了二十一世纪

的今天,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几乎已经没有人信仰文化及历史的普遍主义。曹峰教授此书对这种普遍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并将重点放在“名”的政治思想史上,对其作出几乎全面的研究,也是和上述时代潮流合拍的举动,我想不仅会受到中国及日本等东方知识分子的欢迎,也会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一致欢迎吧。

虽然有些画蛇添足,但在这里还是想强调一点。——尽管上述立场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应不至于过度地拒绝西方、赞美中国,将来自西方之文化的历史的价值与理念一概加以否定。源自法国革命、由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守育下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与理念——例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后来追加上去的民主、和平、人权等,只要我们确认同样的或类似的东西在中国(还有亚洲)传统社会中存在着,那么,即便是来自西方,我们也要将其作为应当积极实现的价值与理念加以珍惜。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的潮流开始到处兴盛。大约一个世纪前,我们日本也犯过同样的致命的错误,七十年前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刚刚开始重新出发。为了不至于重蹈覆辙,我想即使在作中国思想史研究时,也不应该完全拒绝来自西方之文化的历史的价值与理念,而是相反,有必要在作出彻底研究,吸收其精华的基础上,对其加以超越。

第二,曹峰教授这部新著的出现,也是借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直至二十一世纪今天为止出土资料的大量涌现以及研究的发达,才成为可能的。

曹峰教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利用帛书、竹简等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至今已经有近二十年的研究经历。在依据简帛从事思想史研究方面,他以日本东京大学期间提出的硕士学位论文《出土简帛资料所见战国末期的“法”思想:以郭店楚简〈缁衣〉和马王堆帛书〈经法〉为中心》(2000年3月),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2004年4月)等为开端,已经有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其他国家都公认是值得重视的学者。

目前,以中国为震源地,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往研究成果的重新评价以及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势头都非常迅猛。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陆续出土了新的数量惊人而且内容珍贵的古代思想史资料,其研究也在顺利进行之中。因此,仅仅依靠过去传世文献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今天是否依然有效,有必要重新加以考量了。其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中国的古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不再是老一套,为探索古代思想史真实面貌而作出的新的尝试正在不断涌现。在中国出现的这些新的尝试,近年来对

世界上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那些同行们,正给予着强烈的刺激。其三,具体的新研究方法之探索中,令人瞩目的是,对于古书、古史应该如其传承的那样予以完全采信这种“信古主义”的标榜增多了。这一“信古”的立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学界提倡,批判的是曾对现代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的“疑古”。其思想的背后,不仅有着对近年发掘的新出土资料巧妙利用的愿望,同时,也含着意图推进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近年来,“信古”意识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世界上,在学术积累较少的年轻学者间也有扩大的趋势。我想,以上所举三层原因,和上述的价值多元主义也有着深层的关联。

一般而言,如果以和现存传世文献的异同为基准对出土资料做出讨论,那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内容上虽然有若干差异,但相同文本留存于世,出土资料相当于其最古文本之一。通过考察最古的《周易》、《礼记》、《老子》等出土资料,可以对现存的通行本《周易》、《礼记》、《老子》等作出文献考证(textual criticism)。可以针对过去各种通行本中包含的以及依据通行本所描述的思想史内容中包含的误解、疑问、空白等问题,作出纠正、解决、补充。(二)相同的文本已经散佚不存,但有可能比照《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过的文本作出推定。通过考察《宁越》、《黄帝四经》、《孙臆兵法》等出土文献,可以再现那些虽然已经散佚不存,但被人意识到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献,进而有可能复原古代思想史的多重侧面。(三)同样的文本已经散佚不存,而且无法和《汉书·艺文志》著录过的任何文献作出比对。通过考察《五行》、《五十二病方》、《归藏》等出土文献,可以再现那些早已散佚不存,而且连其曾经存在都未曾被人意识到的各种文献,进而对古代思想史的整体面貌作出更为丰富多样的描写。

不管属于哪一种场合,无疑这些出土文献都是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知识新观念的极为重要的资料。但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传世文献以及依据传世文献作出的研究已经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只能说传世文献的意义及其必要性被加上了若干的限定而已。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将出土资料和传统的文献结合起来,才是当今最为紧要的课题。就是说,一方面,有必要摆正出土资料在传世文献中以及依据传世文献刻画出来的古代思想史中的位置,并作出客观评价。同时另一方面,有必要立足于依据出土资料形成的当今的观点,对传世文献以及依据传世文献刻画出来的古代思想史内容重新作出全面的探讨,并作出修正。总之,将以上相反相成的两者,在辩证地统一中加以展开,正是今天最要紧的事情。如果基于这样的观点去考量问题,那么上述的“信古”、“疑古”、“释古”,无论哪一种

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曹峰教授在这部著作的下编第四章中,对《黄帝四经》的“名”作了专题讨论,同时在此书的附论中研究了各种出土文献所见的“名”。不仅如此,此书的很多地方,都论及出土资料特有的表述与思想,并在活用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而且他的研究态度,也并非单纯的“信古”、“疑古”、“释古”,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上,他下了既谨慎又细致的功夫。

第三,曹峰教授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广大的世界,其学问能够公平地对待世界上各种研究,不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的立场,我想这不正是现代史上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所出现的新气象吗?

曹峰教授的学历大致是这样的,他于1981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85年毕业,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8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1990年7月毕业,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怀抱勉学大志来到日本,先于1996年10月,进入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1997年9月退学,历史学专业),以进修生的身份接受了太田幸男教授的指导,太田幸男教授是一位利用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之后因为希望从事更为精深的研究而叩开了东京大学大学院之门,于1998年4月,进入修士课程东亚思想文化(旧称中国哲学)专业,在我的指导下开始依据简帛资料展开中国古代思想史专门研究。两年后于2000年3月执笔完成前面提到的论文《出土简帛资料所见战国末期的“法”思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于2000年4月进入博士课程,2003年9月,博士课程学分修满退学,并于稍后的2004年4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所执笔的博士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因为我于2003年3月从东京大学退休,最终前后加起来我为曹峰教授做了五年半的导师。

曹峰教授于90年代末作为中国的年轻学生到海外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从事学业修行时间上不算很早。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才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曹峰教授通过自己的选择,赶上了研究环境大幅改变的机遇。

在此书中,作者大量引用、参照前人各种论著,在对以往各领域研究史作出批判反思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其范围,从过去的名家名著到当代最热最新的见解,达到非常广泛的程度。这一点,从卷末《主要参考文献一览》可以一目了然。而且,其《主要参考文献一览》不仅有“中文部分”,还设

有“日文部分”。这种学问上的态度,是作者学问客观性的必要保障,不可欠缺。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曹峰教授在引用、参照日本及西方研究业绩时,并不是只有肯定和赞同,在不少地方也是否定、反对的,因为多元的眼光、公平的视角,是当代中国新学术的真精神。只肯定、赞同自己的或与自己相近者的学问,或只肯定、赞同自己大学、自己学派以及自己国家的学问,而否定、反对别人的或与自己不同者的学问,或只否定、反对别的大学、别的学派以及母国以外的学问,这样的研究态度,称不上真正的学问,严重的,将陷于前面提到过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这一点,我作为东京大学教授在指导日本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时,常特别予以强调。

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被中国知识界、读书人广泛接受消化的,不仅仅是研究成果中具体的内容,这些根本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结构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也期待得到认可。

池田知久

2017年4月26日于日本东京练马寓所

王中江序

在为中国名辩学寻求新的解释中,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努力正陆续展现出来。曹峰教授的《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这一著作,就是值得称道的这种努力之一。对于整体上发生在东周数个世纪中的论辩学,这部著作进行了新颖和富有深度的探讨,为这一领域贡献了早期中国名辩学的一个崭新的画面。

包括名家在内的广义的古代早期中国名辩学,我倾向于这样称呼它,在东周时代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事实上,东周时代是中国名辩学发展史上最兴盛的时期。子学家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激励和吸取,孕育出了不限于名家而是贯穿于各个学派之中的名辩学,蔚伟大观,底蕴深厚。

在近代诸子学的复兴中,先秦名辩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地带被关注,围绕它展开的研究和探讨结出了引人注目的果实,奠定了近代中国哲学、逻辑学转型和学术新传统的基础。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人们对名辩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研究力量配置薄弱、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的整体情形。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者们更乐意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和聚焦到中国哲学和思想中的一些显学上,名辩学被作为中国逻辑学的一部分而愈来愈定型化和狭窄化,且不说它作为逻辑学方面的义旨被揭示得如何,实际上,它的多重面向受到了遮盖。造成它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既有外在客观时势的缘故,也有学术自身的影响。曹峰教授指出了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动机,也指出了运用西学资源转化古代传统产生的负面作用。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名辩学转型和研究传统的检查和反思,人们意识到先秦名辩学不是只具有逻辑方面的意义,它同时具有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等更多的、更广泛的意义,甚至这些意义还可能是它更为关注的方面。整体上的名辩学,除了名辩逻辑、名辩语言、名辩认知和名辩方法外,还存在着名辩伦理、名辩规范、名辩政道、名辩法治等各种层面。曹峰教授没有排除名辩学中的逻辑、认知和思维方式方面的意义,但他强调这决非先秦名辩学的全部,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思想。基于这一判断,曹峰教授对先秦名辩

学进行了重新的编组、描述和刻画。除了序言,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名辩学中所涉及的各种政治思想问题作了整体性的概括和探讨;一是对名辩学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文本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我相信热心这一问题的读者能够从中获益良多。

曹峰教授为名辩学的研究寻找的这一新方向具有很强的再生性,它既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方向,又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需要推进和扩展的方向。期待曹峰教授也期望学界沿着这一方向有新的成果。我同曹峰教授曾经为同事,又引以为学术上的同道。承曹峰教授的雅意,谨略述其所观所感,是为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中江
2016年12月25日于北京集虚室

目 录

池田知久序	1
王中江序	1

序言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思路	1
一 先秦秦汉之际“名”是一个流行的话题	1
二 为何以“名”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	2
三 名家与名学研究走向偏差的历史原因	8
四 “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之范围和方法	20
五 本书各章内容	23

上编 与“名”相关的各种政治问题

第一章 关于“名”的政治禁忌	29
一 “名”与人之间的禁忌	30
二 “名”与物之间的禁忌	45
第二章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形名”论、“正名”论、“名实”论	56
一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形名”论	57
二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正名”论	65
三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名实”论	69
第三章 两种名家	74
第四章 “名”与“法”的接点	82
一 战国秦汉时期“名”“法”对举的普遍现象	82

二 “名”“法”对举形成的原因——从思想史的角度	90
--------------------------------	----

下编 个案的分析与研究

第一章 孔子“正名”新考	97
一 至今为止关于孔子“正名”的各种解释	97
二 《论语》中所见的“名”和历史上关于孔子“正名”的引用	101
三 孔子“正名”是“名分”论和“名实”论吗	109
第二章 《荀子》“正名”新论	115
一 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学术概念研究《正名》篇	115
二 为何要寻求“正名” 寻求怎样的“正名” 谁能获得“正名”	123
三 怎样才能获得“正名”	127
第三章 《管子》四篇和《韩非子》四篇所见“名”思想研究	136
一 为何以《管子》四篇与《韩非子》四篇为研究对象	136
二 黄老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137
三 《管子》所见君主与“名”的关系	141
四 《韩非子》所见君主与“名”的关系	146
第四章 《黄帝四经》所见“名”思想之研究	152
一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154
二 《黄帝四经》中的“审名”活动	163
三 “执道者”与“名”的关系	169
四 “名”与“法”的关系	174
第五章 《吕氏春秋》所见“名”的政治思想研究	179
一 《吕氏春秋》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	179
二 前人对《吕氏春秋》所见“名”思想的研究	180
三 《吕氏春秋》“名”思想研究的前提：区别两种“名家”和两种 “名”思想	182
四 对《吕氏春秋·正名》之分析	184

五 对《吕氏春秋·审分》之分析·····	191
第六章 《尹文子》所见“名”思想研究·····	200
一 《尹文子》的真伪问题·····	201
二 《尹文子》的思想属性与成书时代·····	207
三 《尹文子》“名”思想之集大成性·····	212
结语·····	222
附论一 《语丛》一、三两篇所见“名”的研究·····	225
附论二 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圆圈内文字新解·····	240
附论三 《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 《老子》的问世为契机·····	253
附论四 先秦道家的“无名”与“有名”·····	269
附论五 回到诸子：无法之法·····	280
主要参考文献一览·····	289
中文部分(按拼音顺序)·····	289
日文部分(按五十音图顺序)·····	304
已发表与本书相关论文一览(按发表的时间顺序)·····	310
后记·····	314

序言 回到思想史

——先秦名学研究的新思路

一 先秦秦汉之际“名”是一个流行的话题

名家和名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可以说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秦有关“名”的论述极为丰富,孔子、墨家辩者、《老子》、《公孙龙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申子》、《尸子》、《黄帝四经》、《吕氏春秋》、《尹文子》、《春秋繁露》及伪书《邓析子》等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名”,如《老子》首章与“道可道,非常道”相并列的是“名可名,非常名”,可见“名”在《老子》哲学体系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①。孔子被问到为政之首务时,明确回答“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公孙龙子》对其名学功用的最后总结是“至矣哉,古制明王。审其名实,所慎其谓”(《公孙龙子·名实论》)。其他文献对“名”的重视,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礼记·大传》,又见《仪礼·丧服》);“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大体》)^②;“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尸子·分》);“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名〕正者治,名倚者乱。正名不倚,倚名不立”(《黄帝四经·十六经·前道》);“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则

① 有趣的是,郭店楚简并没有看到今本《老子》的第一章,而在语言表达方式以及历代对《老子》首章的引用上,又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史想象,详参本书附论三《〈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

② 此句不见于今本《申子》,是《群书治要》所收佚文。